

略论成都近郊宋墓中的龙形俑

易 立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摘要：本文通过对成都周边一带宋墓所出龙形俑的考察，结合以往的相关研究，认为其形象并非四方之灵中的“青龙”，而可能与唐宋文献记载的“伏龙”有关，起护宅镇墓的功用。

关键词：成都地区；宋墓；龙形俑

中图分类号：K87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62(2009)02-0084-03

在以往的考古发现中，成都及周边一带宋墓中有时可见到一种呈蹲伏状的陶龙，龙的通体表现较抽象，大多系手捏制成形，龙身呈曲弓状，四肢和龙尾立于一平板形器座之上。现按头部特征划分作两型：

A 型：龙头正对前方。以成都西郊外化成小区宋墓^{〔1〕}（端平二年？1235 年）出土物（99CHLM5 右：10，图一）为例，龙身扁平，面部轮廓较清晰，口、鼻、眼、耳、角均可分辨。泥质红陶胎，胎面有白色化妆土，龙头、身施绿釉。长 11.6 厘米、高 7.1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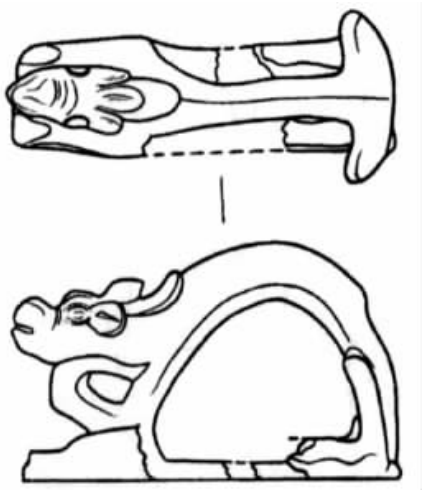
B 型：作扭头侧视状。以成都龙泉驿区十陵

宋墓^{〔2〕}、温江区“塞纳河畔”工地宋墓^{〔3〕}（嘉定二年，1209 年）出土物为例，前者（M2：12，图二）龙头偏向右侧一方，鳍角、鳞甲等细部均无刻画。泥质红陶，胎面无釉。长 12.2 厘米、高 7.8 厘米；后者（2006CWSM1：4，图三）大体相似，唯头部扭向左侧，双耳直立，脊背部还做出锯齿状，以象征鬃毛。泥质红陶，胎面有化妆土，挂黄釉至器底座。长 26.6 厘米、高 18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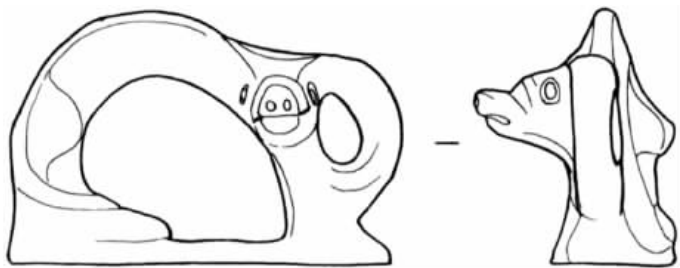
由于与外化成小区宋墓所出龙形俑共存的器物群中还包括鸡、虎、龟等陶质动物模型^{〔4〕}，且该墓买地券上明文“……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等字样，故发掘者推测其应当是配套的四灵俑^{〔5〕}，意即墓中龙形俑象征“左青龙”。此观点颇值商榷，理由如下：

1、自唐末以来，墓中地券文字常书“东至青龙、西至白虎、南至朱雀、北至玄武”，然其所指并非随葬之明器，而是记墓地四界范围。如河南禹县白沙宋墓一号墓砖制地券上即朱书有“东西广十九步南北长二十二步东至青龙西至口口……”^{〔6〕}。北宋仁宗时王洙等撰《地理新书》卷十四《斩草建旌》也提到“用铁为地券，文曰：……买地一段，东西若干步，南北若干步，东至青龙，西至白虎，南至朱雀，北至玄武，内方勾陈，分擘四域”^{〔7〕}。这种在买地券上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方之神作为墓域的四至，实际上是以四灵把守四方，使之安全可靠^{〔8〕}。

2、外化成小区宋墓发掘简报称左侧墓室出土陶虎一件（99CHLM5 左：20，图四），而从残



图一 成都西郊外化成小区宋墓(99CHLM5 右:10)



图二 成都龙泉驿区十陵宋墓(M2 :12)

存器物的形状看,其应当还是龙形俑的个体,只不过属于左墓室主人所有的随葬品。另一方面,简报比定作朱雀的陶鸡也常见于成都近郊其他宋墓,然当中多数不伴出龙、虎、龟,虽不排除有后世盗扰遗失之嫌,但前述“四灵俑说”殊难成立。事实上,根据《大汉原陵秘葬经》的记载,天子、士大夫及庶人墓中均要随葬入玉鸡、玉犬等明器^[9]。此外,作为宋代道教雷法活动最为频繁的地区,川西一带宋墓中时常可以见到相关之文物,而如道书文献《道法会元》即提到过分别作鸠、牛、马、狗、神农相的五方之神^[10],故与龙形俑共出的陶鸡等形象应当另有所指。

基于上面的分析,成都周边宋墓中的龙形俑当与“青龙”无涉,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类随葬品所蕴含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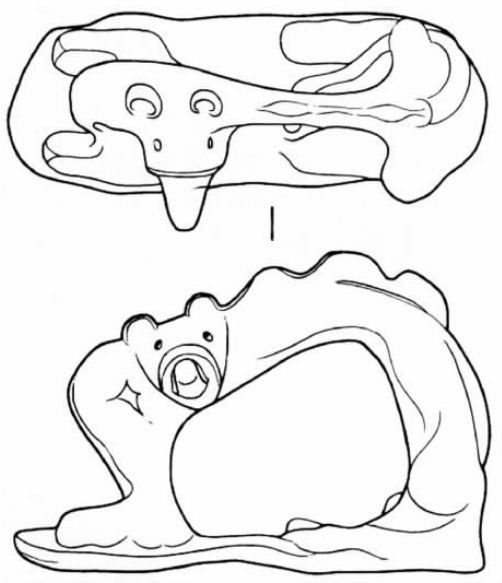
1981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在対北京南郊唐史思明墓的发掘中出土铜龙一件,该龙“呈蹲坐状,头向左斜,张口,牙已残断。颈部有一火焰装饰,前腿直立,后腿曲据,尾穿过后腿裆向上卷至腰部。躯干有鳞片,前肢五爪,后肢三爪。通高16.4厘米”^[11]。类似的蹲坐状龙形器物还见于西安市玉祥门外元代砖室墓所出陶俑中,龙身亦表现有鳞甲装饰^[12]。

对于上述史思明墓出土的铜龙,黄正建先生曾在《唐代的“坐龙”与“伏龙”》^[13]一文(以下简称“黄文”)中有比较详尽的考证,认为其可能与唐宋文献中所记载的“伏龙”有关。按“伏龙”本宅中之神,每年定期要在宅院各处行走,所到之处便伏下来。有“伏龙”在,则不宜动土。如黄文引法藏P.2615号敦煌文书云:“伏龙法:正月二月八月在灶,四月五月在大门,六月七月在墙离,九月在房,十月在台,十一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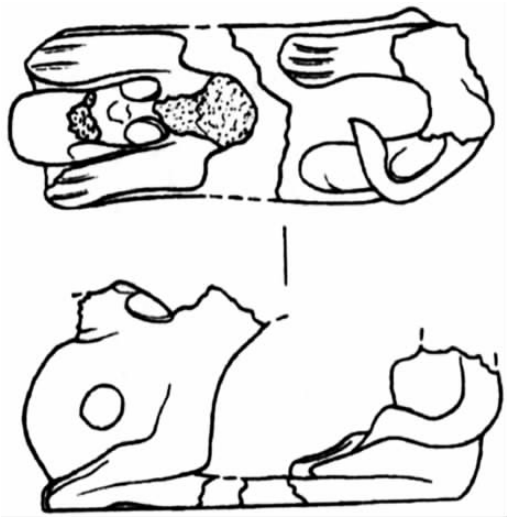
月在堂。又一法;伏龙年年之中移经八处,正月一日庭中起,周而复始:伏龙正月移在中庭,去堂六尺,六十日;三月一日移在堂门内,一百日;六月十一日移在东垣,六十日;八月十一日移在四隅,一百日;十一月廿一日移在灶内,卅日;周还正月一日在堂。”将“伏龙”放于墓内,可知墓是按墓主人生前住宅的形制布置的,而墓中安放“伏龙”

或出于镇宅、镇墓的功用^[14]。换句话说,建墓者们指望依靠它的神力来吓退盗墓之徒。

就成都近郊宋墓中所见的龙形俑而言,龙身均前倾较甚,匍匐于地,更具“伏”的形象,似也同文献提及的“伏龙”存在一定之关联。此外,1978年清理发掘的四川绵阳杨家乡南宋石室墓内出土的两件釉陶质龙形俑^[15]也与前述A型相近,可知这类明器的流布范围并非仅限于成都平原一带。值得注意的是,身体呈蹲伏状的龙形器物在四川地区早至唐代墓葬中便已出现,如青神县观金公社一座晚唐砖室墓即随葬了共计四件的铜质作品^[16],简报称之为“避邪”。其通高逾10厘米,制作工艺虽较显粗糙,但龙头上刻



图三 成都温江区“塞纳河畔”工地宋墓(2006CWSM1 :4)



图四 成都西郊外化成小区宋墓
(99CHLM5左20)

画有双叉角，身有羽翼，无尾，张口吐舌，上颌露一齿，据说出土时分别被放置于四件青釉系罐当中，器表面还附着有可能属稻谷壳一类的残留物。青神县唐墓的这四件铜龙，抑或与史思明墓所出者性质雷同，都属早期的“伏龙”形象。另一方面，同省华蓥市南宋四川宣抚使安丙家族墓（编号M1、M4）入葬的釉陶明器里同样包括两件粘有板座的龙形俑^[17]，其通体则作站立状，且是与朱雀、玄武、白虎共存，表明龙形俑中也存在着扮演“四神”中“青龙”角色的个体，只是外观上已偏离“伏龙”的范畴。现在剩下的问题是，成书年代约在金元时期的《大汉原陵秘葬经》还记载了一种称作“墓龙”的明器，据说上自天子下至庶民墓均不可缺少，尺寸则随等级高低有差，安于辰地。上世纪六十年代，徐萍芳先生曾著文指出如江苏江宁南唐二陵中所出的人首蛇（龙）身俑可能即是所谓的“墓龙”^[18]。近年白彬先生则在《雷神俑考》一文中详细论证了这种人首蛇（龙）身俑的原型很可能系道书文献所云作人首蛇（龙）身的“雷神”，而非“墓龙”^[19]。如此，《秘葬经》提到的“墓龙”究竟所指何物？唐宋墓葬中所见作伏状的龙形俑又是否可理解为“墓龙”^[20]？笔者尚不敢妄下结论，这些都有待于今后进一步地研究予以明确。

注释：

[1][5]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外化成小区南宋墓发掘简报》，载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1999）》，科学出版社2001年。

[2]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龙泉驿区文物管理所：《成都市龙泉驿区十陵宋墓发掘简报》，载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1）》，科学出版社2003年。

[3]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温江区文物保护管理所：《成都市温江区检察院办公楼、塞纳河畔工地五代及宋代墓葬发掘简报》，载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5）》，科学出版社2007年。

[4] 四川广汉西外乡宋墓也出有类似的陶俑群，参见王家祐，《四川宋墓札记》，《考古》1959年第8期。

[6][7] 宿白：《白沙宋墓》61页，62~63页注[98]，文物出版社2002年。

[8] 雷玉华：《成都宋代小型墓葬初析》，载成都市博物馆编，《文物考古研究》331页，成都出版社1993年。

[9][18] 徐萍芳：《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读〈大汉原陵秘葬经〉札记》，《考古》1963年第2期。

[10][19] 白彬：《雷神俑考》，《四川文物》2006年第6期。

[11]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文物》1991年第9期。

[12]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玉祥门外元代砖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期。

[13][14] 黄正建：《唐代的“坐龙”与“伏龙”》，《中国文物报》2001年11月23日。

[15] 何志国：《四川绵阳杨家宋墓》，《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1期。

[16] 李水城：《四川青神县唐墓清理记》，《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1期。

[17]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广安市文物管理所等：《华蓥安丙墓》，37页、121~122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

[20] 徐萍芳先生即认为西安玉祥门外元墓出土的陶龙应当就是《秘葬经》中所说的“墓龙”，参见注[9]揭文。